



江山语言学丛书 柳士镇 著

汉语历史语法散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山语言学丛书 柳士镇 著

汉语历史语法散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历史语法散论/柳士镇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江山语言学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7330 - 2

I. 汉... II. 柳... III. 汉语—历史语法学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287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曹勇庆

特约编辑 陆寿钧

封面设计 杨德鸿

· 江山语言学丛书 ·

汉语历史语法散论

柳士镇 著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71,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250

ISBN 978 - 7 - 208 - 07330 - 2/H · 27

定价 18.00 元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会通。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的是超胜。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就是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

第三,创新。超胜的正道在创新,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

这三点,当为学人悬作标的。自我评估,我们与之距离甚远。但是,有登山的志趣,纵然未必能达峰巅,或可至山腰,但至少是在攀登中;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那只能老死于山麓。

这套丛书冠名“江山”,“江”者,长江也;“山”者,钟山也。

目 录

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 / 001

从语言角度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 / 015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动词时态表示法 / 025

《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 / 036

《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 / 050

《百喻经》中若干语法问题的探索 / 061

《世说新语》语法札记 / 073

萧统《令旨解二谛义》中的选择问句 / 084

略论《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 / 096

询问义动词“问”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 / 119

使动用法的双宾语结构 / 134

谈“齐军善射者”的结构 / 139

洪诚先生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 147

段业辉的《中古汉语助动词研究》 / 152

何亚南的《〈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 / 155

伍和忠的《“尝试”、“经验”表达手段论》 / 161

刘开骅的《中古汉语疑问句研究》 / 163

崔达送的《中古汉语位移动词研究》 / 168

《世说新语》人物言谈中称名与称字的考察 / 172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 / 189

浅易文言文界说 / 201
“下浮”与“左迁” / 204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读后 / 208
古代汉语教学与教材琐谈 / 212

后记 / 216

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①

一个世纪以前《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语法研究从此走上了科学系统的道路;随后不久,《中等国文典》《国文法草创》《高等国文法》等一大批语法著作相继问世,这些书籍均以历史跨度极大的文言为对象进行泛时的语法研究,我们通常称之为文言语法著作。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出现重要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以历史的观点研究汉语语法,主要成果有王力先生《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丁声树先生《释否定词“弗”“不”》等几篇文章,以及吕叔湘先生《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一组论文。由于他们的努力,揭开了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新篇章。特别是吕先生,首先将眼光投向近代汉语,开拓了历史语法研究的新领域。^{[1](P147)}但无庸讳言的是,这几位先生的高瞻远瞩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反响,直到1949年之前,从事历史语法特别是近代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这种现象直到上世纪的50年代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学术研究的氛围趋于安定,历史语法的研究呈现朝气蓬勃的态势。仅以专著而言,通史的研究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断代的研究有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第三章《文法》、管燮初的《殷虚卜辞的语法研究》、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等等。^{[2](P36)}与此同时,日本汉学界也有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牛岛德次的《汉语文法论》等历史语法研究著作问世。虽然后来的“文革”耽搁了十余年,但“文革”后至今复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

不过,当我们回顾“文革”后至今二十余年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时,

① 本文原载2001年第5期《南京大学学报》。

不难发现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冷”的不足。所谓“两头热”，指对上古语法、近代语法的历史研究异常热烈，成果也极为丰富；所谓“中间冷”，指作为由上古转入近代的中古语法的历史研究甚为冷清，不只是研究队伍人数少，成果也寥寥可数。^①中古语法的研究犹如一个瓶颈，制约了上古与近代的贯通，十分不利于科学的语法发展史的建立。2000年10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诸位教授倡议召开了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中古汉语研究的意义、内容、方法、语料及时限等重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有益的收获；会议还确定每年举办一次年会，由有关高校轮流主办。这无疑将对中古汉语包括中古语法的深入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古语法属于断代语法研究的范畴，是汉语语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分期问题，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上，即对近代汉语的时限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且一直延续到会后一段较长的时间。中古汉语的上下时限该如何确定的问题，现在又摆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面前。

中古汉语的概念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他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把汉语分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五个时期。^{[3](P21)}此后，王力《汉语史稿》沿用了中古的提法，主张中古期自魏晋南北朝至南宋前半期，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则主张为魏晋南北朝；^{[4](P10)}^②近些年来，方一新、王云路又提出东汉至南北朝说，^{[5](P1)}目前较为流行的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说就是以此为基础稍加变化而来的。^③日本汉学家另用中世汉语的名称，与我们所说的中古汉

① 中古汉语研究中，词汇的研究成果又要超过语法的研究，因而语法的研究显得更弱。

② 太田辰夫云：“中古，即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但他又说：“这个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代。”再看他将东汉的不少语料放在中古汉语里叙述，实际上与上限为东汉的看法大体一致。

③ 隋开国于公元581年，灭国于公元618年；南北朝终止于公元589年。两说下限仅相差不足30年，就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实不足论。



语含义相同,但时限却定在魏晋至唐末五代。〔6〕(P3)

汉语史的分期确是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因为划定了分期,历史发展的线索会更加分明,时代的特征会更加突出,也更有助于汉语史的系统研究,这就是断代语言研究总须先划出分期的主要原因。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准确的历史分期又必须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必须以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为准绳;而我们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很难提供足以确立分期的客观依据。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断代语言研究必须有分期,科学的分期又依赖于充分的研究。如今之计当可考虑,先根据我们现阶段对于中古汉语的认识,大致划出它的上下限,然后再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其分期,以更符合中古汉语的实际。其实在近代汉语的研究过程中也正有这样一个过程。当年前两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之后,分期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而且至今仍在继续讨论中,但近代汉语的研究却开展得十分热烈,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这又将有助于近代汉语科学分期的确立。看来,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仍将在一个时期内继续下去。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纷乱的时代,汉族往边远地带转移,外族向中原地区推进,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无论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较之前代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因而这个时期应当作为中古汉语的主体阶段。此外,又由于自东汉始汉语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语的语料,如汉乐府等民间诗歌以及部分文人著作中的零星语料;再加上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为了便于向受众说法,汉译佛经往往也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中土文献中的口语化语料与汉译佛经中的浅易形式均对当时及后世的语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似可将东汉视为中古汉语的起始阶段,特点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口语化语料,但还较为零星分散;而主体阶段的魏晋南北朝,口语化语料相对较为集中、较为系统,整个中古时期可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



语法的发展由于它的渐变性,一般总要以前期的语法作为基础,并对后期的语法发生影响,因而各个特定时期的语法规律均有不同程度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各个彼此相承的历史时期连贯起来,就形成了整个一部语法发展史。但语法的发展由于内部外部多种因素的作用,其演变又不是匀速均衡的,不同的时期出现多与少、快与慢、显与隐等变化上的差异是十分正常的,这使我们可以据此来划分语法发展的不同分期。因此,语法的发展总是同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某些语法要素此期之前尚未出现,只是此期萌生、此期发展,此期之后即行消亡,尽管这只是较为少见的现象,但正反映了该时期的时代特色。二是某些语法要素此期之前萌生、此期发展,体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反映了该时期语法在继承基础上对前期的演进。三是某些语法要素此期萌生、此期之后发展,体现了质的新生,反映了该时期语法的发展对后期的启迪。这三种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演变都是我们研究某一特定时期语法历史地位的重要内容。

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体阶段的中古时期,其语法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自上古至近代的过渡,旧有形式仍然大量沿用,消亡者只是极少数;新兴形式已经陆续产生,但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发展,确立优势。因而整个中古时期反映了新旧语法形式的交替,诸多语法形式的萌芽或发展,至近代时期得到巩固流行,从而逐渐奠定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这些语法形式的萌芽或发展,同时表现在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现举其要者,说其梗概于后。^[7]

1. 名词

主要表现为词缀的发展。

前缀“阿”字产生于东汉,主要用于人名或“谁”字之前,含有亲昵的意味。魏晋南北朝期间,又可缀于姓氏、人名、表字、小字之前,或用于亲属称谓之前,或用于代词之前,仍然含有亲昵意味。“子”字上古时已有虚化为后缀的趋势,中古时运用普遍,可以表示人物、动物、植物、器



具或其他物体。唐宋之后构词能力进一步增强。“头”字在魏晋时虚化为后缀,中古期间常用于方位名词或表示事物的名词之后。唐宋时期普遍运用。“儿”字的虚化萌芽于东汉,但中古期间,虚化程度较深者少见。唐代时“儿”字的后缀用法发展成熟,构词能力也得到加强。

词缀“阿、子、头、儿”均一直沿用到后代。

2. 动词

主要表现为时态表示法与助动词的发展。

上古汉语中的动词时态主要用副词来表示,“既、已”等表示过去时态,“方、正”等表示现在时态,“将、且”等表示将来时态。中古时期,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出现了新的表达方式。用表示“完结”义的动词“毕、竟、讫、已、了”等置于谓语动词之后充任补语以表示动作的完成,用表示“附着、放置”义的动词“著”字置于谓语动词之后充任补语以表示动作的持续。表示将来时态的副词则产生了“欲、要”两种新形式。“毕、竟、讫、已、了”等与“著”字本来均为实义动词,当它们置于谓语动词之后充任补语时,词义已经部分虚化,只是说明谓语动词动作的完成与持续。尽管它们尚未发展为时态助词,但是汉语中这种表示动作时态的成分由谓语动词之前移往谓语动词之后,由用副词充任状语从时间上对动作进行限制,变为用部分虚化了的动词充任补语从结果上对动作进行补充说明,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转变。现代汉语中的时态助词“了”与“着”在唐宋时期的最终形成,正是以中古期间的上述用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助动词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添了一些新的单音节助动词,如表示可能的“堪、容、办、中”,表示意愿的“要”,表示应当的“应、合、须”。二是出现了一批组合使用的助动词的双音节形式,如表示可能的“容可、容得、办得”,表示应当的“当须、须当、当应、应当、宜当、当宜、宜须、应须、宜应、应合、要应、要须、要当、要宜、会当、会应、会须、必须、必应、必宜”。其中大部分形式在唐宋时期仍有运用并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

3. 形容词

主要表现为 AA 式叠根形容词使用上的变化与形容词后缀“馨”的产生。

AA 式叠根形容词上古已有用例,但为数甚少,此期不仅用例增多,而且在原有描写性质的基础上又加重了修辞上的强调作用;此外,当它们充任定语或谓语时,与被修饰或被说明的名词之间已不必如上古时期那样在位置上直接相连,而可以插入其他修饰成分,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馨”字是此期新生的形容词后缀,可用于动词“如”字及其宾语之后,表示“像……一样”、“像……一般”的语义,或用于指示代词“宁、尔、如”后构成“宁馨、尔馨、如馨”,表示“那样、那般”,“这样、这般”。“馨”字晋宋之前未见使用,隋唐以后又多用“生”字,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4. 数词与量词

数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概数、序数、问数、零数上,量词的发展同时表现在名量词与动量词上。[8]

概数在表达上增添了不少新形式,有的用尾数相邻的两个数如“十八九”表示概数,有的用 AABB 式的数词重叠如“十十五五”表示概数,有的用“垂、减、向、约”置于数词、数量词组之前或用“许、强”置于其后表示概数;并且产生了专用的概数词“数四、如干”。序数中前缀“第”字发展成熟,“第十数词+中心词”的完整表达形式已有较多运用。问数出现了“多少、几许、几多”等表达方式。零数中,用于诗歌的“三千三”可以表示三千三百,与传统表达方式中“百五”表示一百零五已开始有实质上的不同。

量词的发展是中古最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作为量词体系核心部分的表示个体事物天然单位的个体量词此期得到迅速发展,大约新生

了一百来个；而且在语法功能上又有新发展，可以用于 AA 式的重叠，与序数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组合，量词作为词根或后缀还可用来构成名词。再加上集合量词的增多，度量量词的趋于规范，临时量词借用范围的扩大，均反映了名量词的全面成熟。动量词已有专用与借用的分别。专用的动量词有“过、番、遍、回、通、下、次、周、匝、反、合、度”等十余个，借用的动量词有“声、拳、口、杵、槌”等五六个，语法功能又扩展到与序数词或指示代词组合，反映了动量词的初步成熟。

中古时期数词与量词的成熟状态为它们在唐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5. 代词

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均有明显的发展变化。

人称代词的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新生了“身、依”两个分别具有时代特色或地域特色的第一人称代词。二是“汝、尔”新生出尊长者称呼卑幼者时表示亲昵的感情色彩；萌芽了第二人称代词“你”字，到唐代时即广泛使用。三是“其”字突破上古的束缚，可以用作主宾语；第三人称代词新生了“伊”与“渠”，“他”字也处于萌芽阶段，为唐代时的形成与确立准备了条件。四是新生了类及之词“比”字，以及作用相当于第一、二人称代词的谦称与尊称大量运用。

指示代词主要有三点发展。一是“尔”字的用例增多，指示样状更为常见；“是”字发展出指示任何事物的任指用法。二是新生了“阿堵、宁馨、尔馨、如馨、许、渠”等指示代词。“阿堵、宁馨、尔馨、如馨”具有时代色彩；“许”字则具有南方地域色彩，既可指示事物，又可指示样状，指示样状的用法在唐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三是某些唐宋时期广泛流行的指示代词在此期出现偶发性的运用，如指示事物的“那、个、就”，[9](P243) 指示样状的“能”等。[9](P296)

疑问代词的主要发展也有三点。一是利用上古沿袭下来的“谁、何”构成新的语法形式，或者原有的由它们构成的语法形式可以表达新

的意义,这些形式有“阿谁、何者、何等、何物、何所、何如、何似、何当、那……何”等。^{[4](P69)}二是产生了一些疑问代词的新形式,如主要表示反问,兼可询问原因、方式、处所、时间的“那”字,与“何”字大体相当却又具有南方地域色彩的“底”字,用例渐有增多的“所”字,以及询问度量的“若”字与询问方式的“若为”。三是与询问有关的“多少、早晚、远近”等由正反义形容词组成的新格式开始出现。这几个方面的新用法大多延续到唐宋时期。

6. 副词

副词较之上古有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一是呈简化、规范的趋势,纷繁歧异的现象开始消失,作用相同的副词形式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前期习见的副词后缀,此期常用者仅留下一个“然”字。二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副词以及副词后缀“自”与“复”。新兴的副词主要有:程度副词中表示极至的“偏、过、奇、酷、差、熟、绝”,表示转甚的“更、转”,表示轻微的“微、差”;范围副词中表示总括的“都、了、初、全、略、差、总、顿”,表示齐同的“通、齐”,表示仅独的“正、政、劣、只、单、空”;时间副词中表示曾经的“经”,表示将要的“行、欲”,表示立即的“顿、登”,表示随即的“便、仍、寻”,表示频数的“仍、频、累”,表示每常的“每、动、经”,表示往近的“向、比、近、当”;情态副词中表示猝然的“忽、猥、奄”,表示徒然的“唐、空、坐”,表示恰适的“幸”,表示偶然的“偶”,表示几近的“垂、仅”,表示持续的“故、还、方、仍”,表示且暂的“暂”,表示类同的“也”,表示相互的“互”;语气副词中表示确认的“定”,表示或然的“脱”,表示疑问的“颇、可”,^{[10](P245)}表示测度的“将、宁”,表示反问的“将、更、可”,表示使令的“仰”;指代性副词“相”与“见”。这些新兴的副词大多沿用到后代,成为近代汉语副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新兴的后缀“自”与“复”使用普遍,大大增强了副词的构词手段。三是与双音节词汇的增多相适应,新旧副词也常以双音节的形式出现。这种副词的双音节形式又可分为组合使用与结合成词两类。前者包括同义副词的复合使用



与词组的凝用两种,后者则包括后附词缀“自、复、尔、然”的合成词与产生了副词新义的联绵词两种。副词双音节形式的构成方式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介词、连词、助词

介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旧形式的更迭上。一是上古较为繁复的介词体系,开始出现简化、规范的趋势,在保留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介词形式的同时,淘汰了一些意义与作用重复的介词。二是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介词。新兴介词中有些是上古萌芽、中古发展并广泛流行的,有些则是中古新生并开始运用的。新兴的介词主要有:时地介词中表示处在义的“在、着、垂、夹”,表示及至义的“投”,表示向对义的“向、当、对”,表示沿循义的“扶、寻”;原因介词中的“坐”;方式介词中表示依据义的“依、缘、凭”;人事介词中表示向对义的“向、对”,表示偕同义的“共、将、合、连”,表示被动义的“被”。

连词的运用有四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淘汰了一批意义重复的连词,整个体系呈简化的趋势。二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连词,以及新生的连词后缀“复”。新兴的连词中,多数为此期出现并普遍运用,少数此期之前萌芽、此期流行,个别则为此期萌生、唐宋时期才流行开来。这些连词主要有:表示并列的“共、将”,表示进层的“并、加”,表示选择的“为”,表示转折的“还、但”,表示因果的“由、因”,表示假设的“脱、自”,表示让步的“就、正、便、自”。此外,副词后缀“复”字又因类化作用而用为连词后缀。三是前期已经较常出现的连词同义复用,中古得到进一步发展,又可以分为旧有连词的同义复用与新旧连词的同义复用两种。前者如表示假设的“若其、如其、苟其、假其、设其、傥其、假使、假令、若令、设令、设使、借使、若使、傥若”,表示让步的“虽使、虽令、虽其、纵使、纵其、即使”;后者如表示假设的“脱若、脱其、如脱、若脱”,表示让步的“就使、正使、就令”。四是某些固定使用的词组逐渐凝定为双音节连词,主要有“于是、所以、因此、万一、不但”;带“复”字后缀的附加式合成

连词主要用来表示假设与让步,主要有“若复、虽复、纵复、假复、况复、脱复、就复、正复”,表示选择的则有“为复”。

助词的变化主要有三点。一是随着语法结构的日趋紧凑严密,上古汉语中大量语法作用较弱的语气助词自然趋于消亡,只保留了较为常用的一小部分。二是个别新兴的句末语气助词有了少量的运用,如表示疑问或反问的“那”字。三是“看、将、却、著”等几个助词正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10](P58)}

中古时期介词、连词、助词的萌生与发展,形成了它们在唐宋时期进一步演变成熟的基础。

8. 构词法

中古汉语构词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单词的双音化。双音词增多的主要因素在于外语的汉译以及汉语表达中形式美与精密化的要求。而此期构词法的特点,一是音译佛经词汇为主的外来词产生了大量的双音单纯词,二是运用词根附加词缀的派生法与意译佛经词汇为主的外来词产生了大量的双音合成词。发展到宋代以后,语音的简化产生了大量同音词,单词的双音化因其区别同音词的作用而发展更为迅速。

9. 词序

词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处于由前置向后置的发展过程中,大致说来新兴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以后置为主,固有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也常可后置。二是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后置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词序。不仅新兴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不前置,即便是固有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也大多不前置。三是数量词组内部先量后数的词序已渐趋淘汰,先数后量的词序已成为主流;而数量词组与名词组合时前附的词序正在逐渐形成规范,后附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四是表示谓语动词动作主体位置的介宾结构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词序,以置于动词之前为主,不仅由新兴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要前置,即便是由固有的处所介词组成